

【文化交流】

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中国对非洲 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探索

卫白鸽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跨文化传播建构过程可以概括为跨文化理解、跨文化尊重、跨文化互动和跨文化认同4个维度。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主体日益扩大,传播内容日趋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传播受众逐步增多,传播成效较为显著。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在认知层面,文化差异影响中非跨文化理解;在态度层面,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尊重;在互动层面,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互动;在认同层面,“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影响中非跨文化认同。鉴此,中方需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促进中非文化交融与相互理解;创新议程设置,加快构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叙事体系;畅通跨文化互动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中非文化折扣;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间性以实现文化间性落地,进而促进中非价值认同、身份认同和命运共同体认同。

【关键词】中非关系;跨文化传播;跨文化认同;文化差异;文化共性;文化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卫白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24.2.145~17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非洲研究院与南非联合研究课题“人文交流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CAI-J2021-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剖析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的重大历史性意义,发出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最强音,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这一重要讲话也为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以及扩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尽管中国与非洲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在文化上也存在差异,但中非交往源远流长,文化交流是中非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文明互鉴持续推进,这对于促进中非相互理解,增进彼此友谊,加强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传播的交流互动本质来看,中非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包括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也包括非洲对中国跨文化传播。基于此,学术界围绕此议题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一些学者深入分析了西方媒体全面构建非洲负面形象的“非洲范

式”,提出中国对非传播应超越这种“非洲范式”,实施精英化与大众化齐头并进的传播战略。^②另一些学者从媒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发展情况,中非媒体合作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对非传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对非传播话语体系、提升对非传播能力等问题。^③近年来,孔子学院和中文国际教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分析研究了非洲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效果,并提出深化中国语言文化在非洲传播的策略建议。^④影视传播也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提及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被译成斯瓦希里语在当地热播,从此掀起了中国影视剧译制片走进非洲的热潮,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也相应增多。^⑤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非传播,有学者从时代语境、价值取向、核心话语、策略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⑥可以说,现有研究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较好基础。但是总体来看,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是数量少、零散化,缺少体系化、理论化的研究。就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而言,“为数甚少的理论研究,大都为介绍国外研究范式或是直接将欧美理论本土化移植的生硬之作,鲜见聚焦于本土文化实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⑦关于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迫切需要学者们借鉴既有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将其与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实际相结合,以此为基础分析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和特点、问题及挑战,进而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及路径。

一、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理论阐释

当今世界,全球化深入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下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交流、融合已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世界文化边界逐渐模糊,人类社会日益呈现跨

文化特征。与此同时,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愈加显现,国际竞争进一步由政治、经济领域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扩展。对此,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⑧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不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正全面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他在1957年出版了《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开辟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新领域。学术界对跨文化传播定义有多种多样,但总体上认同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传播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⑨跨文化传播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根据交际方式的不同或是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爱德华·霍尔在其《超越文化》一书中,将不同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或者还有中语境文化(middle context)。在他看来,美国是典型的低语境国家,人们进行交流主要依靠语言本身,喜欢直接坦率的表达方式;而中国则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人们进行交流更多地依赖语境,喜欢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中国,这个拥有伟大而复杂文化的国家,却处在这个阶梯上高语境的极端。”^⑩包括北非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也属于高语境文化,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属于低语境文化。关于跨文化传播模式,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由“5W”模式进而演绎出传播学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⑪尽管人们对这一模式多有批评和非议,如认为它是政治宣传模

式,是单向的和线性的模式,忽略了受众反馈和传播环境影响等,但是不可否认其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也是分析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理论框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几十年来,一批中国学者致力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总体来看,“缺乏科学的、富有成效的本土研究,照搬西方理论而忽视本土适用性研究的现象大量存在,进而也就导致了具有批判意识和实践指向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缺乏。”^⑫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建构依然任重道远。

(二)跨文化认同理论

将“文化”与“认同”联系在一起,最早提出文化认同理论的是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他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⑬爱德华·霍尔也认为,“文化中最重要心理要素是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认同是文化与人格的桥梁。”^⑭关于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英国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国家民族凝聚力及国家认同的基础。”^⑮毋庸置疑,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这至少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文化融合,二是文化冲突。要避免或减少文化冲突、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仅是对自身的、本民族的、本国的文化认同是不够的,人们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面对、接纳和学习外来文化,在坚持自身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不断超越自身文化认同,努力构建异质文化或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即跨文化认同,这成为全球化在文化

领域的一大表现或特征。

基于此背景,美国学者彼得·阿德勒(Peter Adler)提出“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man)概念,旨在超越单一文化认同,构建跨文化认同,在跨文化传播学界引起极大反响。^⑯由此,跨文化认同成为跨文化传播学经典理论命题之一。跨文化认同一方面是为了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兴关系,另一方面旨在通过学习借鉴其他文化来不断丰富提升自身文化。“跨文化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交际者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基,全方位地开发自我,不断吸收与整合其他文化元素,扩展文化认同,逐步商讨协议和积累共识,进而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⑰跨文化认同超越了人们的自我文化认同,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野,扩大了人们的文化互动空间,既有利于促进自身文化发展进步,也有利于构建良好的文化关系。

中国学者对于文化认同的认知不断深化。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理论。他还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⑱思想,彰显处理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境界。此后,中国学术界主要围绕文化认同的概念、内涵、作用及其与民族认同、国际认同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⑲郑晓云的《文化认同论》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文化认同研究的学术专著。他指出,“在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文化相互间交流与融合中,对于文化的认同——包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异文化的认同两个方面,是一个核心的问题。”^⑳人类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能否相互认同,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认同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重要性不亚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问题之一”^㉑。

(三)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就是把一

些文化现象置于同一语境下,以消解文化差异,达到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最终实现对政治合法性的支持。”²⁸就中非文化而言,毋庸置疑,双方存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共性,这是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基础。因为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或者异质文化之间进行的,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而跨文化认同则是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没有文化共性就没有跨文化认同。中非文化的差异性包括性格和气质差异、行为方式和金钱观差异、国家观念和国家感情差异、历史文化和历史进程差异等。²⁹与此同时,中非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集体主义、尊老敬贤、平等观念、宽容待人等方面³⁰,亦可具化为“都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注重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都注重集体主义观念和家庭观念,都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并反对外部干预”³¹。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乌班图思想研究日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二者都重视“仁爱、和谐、宽容、分享、团结、责任”等理念,这是中非文化共性的重要体现。³²从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来看,就在于异质文化间产生的相互认同和互补,以及新意的整合,通过加强整体和共同发展,来构建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构建文化命运共同体。³³从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来看,就是为了“达成人与人之间彼此倾听、彼此宽容与理解的文化关系”³⁴。

跨文化传播建构过程可以概括为跨文化理解、跨文化尊重、跨文化互动和跨文化认同4个维度。而跨文化认同建构过程可分为3个层次认同的相互构建:价值认同、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这也是本文分析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

跨文化理解属于认知层面,是不同文化主体对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及其共通性的认知。只有增强文

化间理解,才能消除文化间隔阂与误解,这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跨文化尊重属于态度或情感层面,不同文化之间本着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交往,消除文化中心主义(或称民族中心主义),摒弃刻板印象、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前提。跨文化互动属于行为层面,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互动形式和工程,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文化是一个信息系统,其中互动是文化的核心,是万物的本源。“归根结底,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涉及与其他事务的互动。互动寓于文化万象的枢纽中,一切事物都生于互动。”³⁵文化是一种互动性的存在,人们只有在互动中才能感知相同和相异的文化,否则就容易变成“标签化”理解。只有回到“互惠性理解”,即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才能超越文化偏向,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³⁶

跨文化认同属于结果层面,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寻求文化共性、达成文化共识并构建文化共同体的过程,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宗旨和意义所在。跨文化认同至少包括3个维度:价值认同、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价值认同是不同文化主体对它们所秉持的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的认同,这是跨文化认同的内在核心。例如,中非之间均奉行集体主义和多边主义,那么集体主义和多边主义便是中非价值认同的一部分。在英语中,“identification”一词本身既有“认同”又有“身份”的意思,身份认同是不同文化主体对它们所拥有的共同或相似的身份属性及角色地位的认同,这是跨文化认同的外在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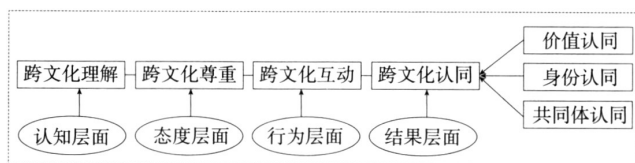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理论逻辑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现。又如,中国与非洲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它们均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都是中非身份认同的具体写照。共同体认同是不同文化主体对它们所属于的共同体认同及构建,这是跨文化认同的要旨和目标。“人类发展史产生了原始共同体、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古代出于政治斗争需要的政治共同体、到中世纪的基于宗教信仰的信徒共同体、近代异化的市民共同体、民族共同体、阶级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乃至现代国家共同体、国际共同体和全球共同体等各种形态的共同体。”^⑧在所有类型的共同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最高层次的共同体。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及构建,是中非跨文化认同的重要目标甚或是最高目标。

总之,和谐的跨文化传播是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互动,由此形成包括价值认同、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在内的跨文化认同,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兴、共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特点

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已取得积极成效,呈现以下几方面突出特点。

(一)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主体日益扩大

跨文化传播主体是回答“谁来传播”的问题,主要包括人员、组织和媒体等传播主体,它们分别对应的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与三大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一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得到极大促进,但也带来了文化碰撞、摩擦和冲突;二

是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极大改变了跨文化传播方式;三是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时代,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且人员交往持续增多,极大推动了中非跨文化交流。

在人际传播方面,中非人员交往扩大为跨文化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公派人员,包括外交人员、援非医疗队员、孔子学院教师和志愿者、农业技术专家以及少量留学生等;第二类是企业员工、私营业者、务工人员等;第三类是长期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华侨华人,他们中有少部分人已加入当地国籍,但大多数人仍保持中国国籍。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这些在非洲的中国人都会成为跨文化传播主体。

在组织传播方面,中国政府提出并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国家对外跨文化传播的组织者、设计者和引领者。中国企业并非“专职”跨文化传播者,但其跨文化传播的功能非常强大。截至2020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各类企业超过3500家,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非投资的主力,聘用非洲本地员工比例超过80%,直接和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国际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截至2021年底,中国在非洲合作设立了61所孔子学院和48所孔子课堂。^⑨此外,中国还在毛里求斯、贝宁、埃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摩洛哥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近年来,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和智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它们肩负着深化对非文明互鉴的重要使命。

在大众传播方面,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中国日报社、中国新闻社等,通过设立分社、分台、记者站等方式进入非洲,加强与当地传媒机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以四达时代为代表的民营媒体积极开拓

非洲市场,在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南非等30多个非洲国家注册成立公司,开展数字电视和互联网视频运营。中国媒体进入非洲在当地传播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搭建了中非沟通的桥梁,促进了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增进了中非相互理解。

(二)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内容日趋丰富

跨文化传播内容是回答“传播什么”的问题,这是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为王”是跨文化传播有效性的核心要素。^③中国和非洲都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非洲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孕育了古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斯瓦希里文明、豪萨文明等。中华文明和非洲文明交相辉映、交流互鉴,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④历史与现实均厚植了中非情感相通和民心相通的基础,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也体现了中非文明对话、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非友好合作等鲜明特色。

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它们分别对应“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构建起全面立体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使非洲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根源,为中非文明对话奠定基础;更好地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为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更好地了解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思想理论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非传播的要义,也是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最核心的内容。在价值观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主要价值取向。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跨

文化传播的核心是价值观传播,这些价值取向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中非传统友谊的生动写照,还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中非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在精神引领方面,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中国医疗队精神和丝绸之路精神等,是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精神引领。这三方面精神既各有侧重又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中非共同珍视的精神财富。

(三)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渠道不断拓展

跨文化传播渠道是回答“怎么传播”的问题,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广义的跨文化传播渠道有很多,其中媒体传播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⑤不仅在中国发展迅速,而且在非洲普及率也越来越高。据统计,非洲网民数量在2000年底只有450万人,而到2021年底已超过5.9亿人,增长了130倍,是全世界网民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非洲互联网渗透率为43%,正在缩小与世界平均值(64.2%)的差距;截至2022年4月,非洲仅脸书(Facebook)用户就已超过2.55亿人。^⑥因此,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扩大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已是大势所趋。除媒体传播以外,中非政治交往、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也能带来或促进跨文化传播。其中,中非人文交流以其具有主体多元、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等特点,成为促进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传播渠道机制化是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一大特点。历届中非合作论坛均把人文交流列为重要内容,如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中非“人文合作计划”,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中非“人文交流行动”,2021年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提出中非“人文交流工程”。中非合作论坛设立了中非媒体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等分论坛。2017年4月,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建立,这是首个中非高级别人文交

流机制。截至2020年12月,中非签署并落实了346个双边政府文化协定执行计划。截至2021年底,中国与31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旅游合作文件,已将34个非洲国家列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⑤“在人文交流的具体实践中,文化是核心内容。”^⑥上述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极大促进了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

(四)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受众逐步增多

跨文化传播受众是回答“向谁传播”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总体而言,非洲传媒业发展较为落后,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经济条件的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有所不同。例如,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广播主要面向农村人口,电视主要面向城市居民,报刊主要面向少数精英阶层,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主要面向城市青年人口。而且,非洲国家语言众多,除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殖民宗主国语言以外,还有阿拉伯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等众多非洲本土语言。根据不同受众实施有针对性的精准传播,是中国媒体对非传播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已使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等通用语或当地本土语言对非洲进行广播,并且通过与当地传媒机构合作,在加快节目本土化步伐、增加落地频率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从而不断扩大了当地听众数量。

在人际传播或组织传播方面,随着中非各领域合作不断加深,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受众面越来越广。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例,截至2021年底,中国累计向非洲派出医疗队员2.3万人次,诊治患者2.3亿人次。^⑦他们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与当地社会各阶层人士直接打交道,进行面对面的文化交流,践行中国医疗队精神,极大促进了中非相互了解和友谊,因此被称为“白衣使者”“最受欢迎的人”。由于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国援非医疗

队荣获2014年“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集体奖。^⑧在教育方面,非洲各国的孔子学院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文学习者和中国文化爱好者。与此同时,来华留学的非洲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从2014年起,中国已超过美国和英国而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热门目的国。^⑨根据中国教育部数据,2018年非洲来华留学生总数为81562人,约占世界各国和地区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7%,仅次于亚洲(约占60%)。^⑩这些来华留学生不仅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专业知识,还把各自国家不同的文化带到中国,成为中非之间的文化桥梁,促进了中非跨文化双向传播。

(五)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效果较为显著

“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个持续性的核心命题是传播效果研究。”^⑪传播效果是跨文化传播的落脚点,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终归要看产生的效果如何。就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而言,虽然难以有量化的数据,但是从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以及国家形象构建的角度看,传播成效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9月,知名调查研究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非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来自18个国家的民意调查》。这份调查报告的受访者来自18个非洲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采取面对面调查的方式,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在被问及哪个国家或组织对本国政治经济发展最具积极或消极影响力时,5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本国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排名第一,高于美国(58%)、地区强国(49%)、前殖民宗主国(46%)和俄罗斯(38%)。^⑫2022年6月,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Ichikowitz Family Foundation, IFF)发布的《2022年非洲青年调查》显示,非洲青年人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对非洲最具影响力的非洲大陆以外国家。非洲青年人还认为,中国为非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给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⑬上面两份调查报告来自不同机构,

面向不同人群,覆盖不同国家,但是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相同。无论是中国发展模式还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得到的认可度和赞誉度都在不断上升。这充分反映出中非合作深入人心,日益受到非洲人民欢迎,也说明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成效显著,从而有利于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构建。

总体看,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极大促进了中非文化认同,加强了中非民心相通,深化了中非文明互鉴,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复杂因素,中非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而且存在一些文化偏见。加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大行其道,全球传播秩序严重失衡,致使中非之间在跨文化理解、跨文化尊重、跨文化互动等方面都面临一些挑战,进而影响到中非跨文化认同。

(一) 认知层面:文化差异影响中非跨文化理解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土壤。文化的多样性或者多元性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而这种具有差异性的文化恰恰也是各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基础。^④跨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缩小或克服文化差异,扩大文化共性,获得文化认同乃至文化融合的过程。如前文所述,学界已对中非文化差异和共性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但是总体来说还不够全面深入,而且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从而影响到中非跨文化理解,并由此造成一些文化误解、文化隔阂、文化折扣乃至文化冲突。

无论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也无论是语言体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模

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以及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方面,中非文化差异都是显而易见的。仅以语言、宗教和政治制度为例,便可略窥一斑。在语言方面,作为文化的重要或者首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⑤在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中,语言问题一直是一大障碍。首先,非洲大陆语言种类繁多,非洲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政策非常复杂,如南非的官方语言达到11种之多。其次,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甚至包括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通常是以英语、法语等作为媒介的,这种情况使文化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再次,虽然中文国际教育在非洲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与其他语言相比,中文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远远落后。根据非洲晴雨表关于语言学习的调查情况,在被问及哪种国际语言对青年人学习而言最好、最重要时,71%的受访者选择英语,居遥遥领先位势;其次是法语,占14%;第三是其他语言,占9%;第四是阿拉伯语,占4%;选择中文的受访者仅占2%,排在最后位置。^⑥在宗教方面,非洲各国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划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三大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又有若干分支。传统宗教更是五花八门,难以计数。中非在宗教方面差异巨大。非洲人对中国的多宗教状况和宗教信仰自由缺乏了解,并存在一些疑惑,这也是在中非跨文化交往过程中时常面临的文化差异。在政治制度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普遍实行西式民主制,奉行三权分立,定期举行各类选举。非洲国家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缺乏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误解。这些差异和误解凸显了中非之间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性。

总之,中非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文化内核、特质、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非洲各国之间又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呈现明显的文

化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跨文化传播通常是在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中非文化差异一方面为跨文化传播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困难或障碍,需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方能促进跨文化理解、尊重和认同。

(二)态度层面: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尊重

文化中心主义,也称民族中心主义,即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观察和评价他者,特别是在文化冲突发生的时候,每一种文化都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以凝聚文化群体的信念,取得对他文化的支配权。与文化中心主义相伴随的是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它们共同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阻碍。^④刻板印象会导致偏见,而偏见表现出来即为歧视,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人们反思跨文化传播中的非理性问题,消除跨文化传播障碍,实现跨文化尊重和认同。

任何两种文化碰撞时,都难免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用自己的文化价值来判断其他文化,这是由文化的不自觉性特点决定的。这种情况在中非文化交往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并由此产生了刻板印象、偏见乃至歧视。关于中国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或偏见,不少人认为非洲是一个贫穷、落后、战乱、政变、饥荒、疾病的大陆,但忽略了非洲土地辽阔、风景秀美、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有贫有富、有乱有治的另一面;有人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包括向非洲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在内,都是“乱撒钱”“重外轻内”,但忽略了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忽略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且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关于非洲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或偏见,以非洲晴雨表的调查为例,一些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到非洲是为了攫取资源、购买土地,中国企业雇佣的中国人多于当地人,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差,中国投资会冲击当地产业发展,中国喜欢与专制和不透明政权打交道。^⑤此

外,还有极少数中国人出现不尊重当地习俗、不遵守当地法律、不融入当地社会、不保护当地环境等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非之间的文化偏见甚或歧视曾被一度放大。广东省疫情防控涉及非洲国家公民事件引起广泛关注,非方有一种失实观点,即认为在华非洲公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歧视,而在中方看来,也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是在华非洲公民不遵守防疫规定甚至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两种观点虽非主流,但在疫情大背景下都尤为敏感。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所有外国在华人员一视同仁,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反对任何种族主义、歧视性言论。此事件最终得到妥善处理,并未影响中非友好大局,却凸显了跨文化交往中偏见和歧视的潜在危险。

(三)互动层面: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互动

“文化帝国主义”由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率先提出。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少数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国内外大众媒体,强制性地输出自己的政治文化、商业规范、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这是近代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延续。^⑥后殖民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则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⑦这一观点将文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表明文化在帝国主义扩张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政治统治、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3种方式,其中尤以文化侵略的危害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随着殖民统治土崩瓦解、新兴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帝国主义转而更加重视用文化手段来为其扩张主义服务。正如赫伯特·席勒所言,“美国制造”

的讯息在全球传播,发挥着作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的作用。^⑤在此大背景下,无论是非洲国家还是中国,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和影响。

文化殖民主义摧毁了非洲固有的传统文化,并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语言和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非洲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而且代代相传。“对于非洲人民来说,一方面痛恨历史上西方殖民者的劣迹,另一方面已习惯于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包括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⑥文化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在文化上的“西化”倾向,西方文化充斥着非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你知道吗?在尼日利亚电视黄金时间播出节目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电视节目,其中许多是肥皂剧……尼日利亚人显然是收看这些节目的,因为除了这些节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节目可看了。”^⑦这种情况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是非洲本土传统文化影响式微,二是非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受阻。对此,有非洲学者指出,“非洲人已经被西方文化‘洗脑’,本地文化被忽视,日益被边缘化,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则知之甚少。”^⑧

非洲自近代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以来,始终以“非洲与欧洲”“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二元认知结构与关系维度来理解自身、理解世界,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西方文化成为非洲无可选择的选择。^⑨而在数百年“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和裹挟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文化交流,包括“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两大方面,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甚少,与遥远非洲的文化交流则更少。这就造成了中非之间的文化影响力较弱,非洲人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中国人民对丰富多彩的非洲文化也认知不多。加之,文

化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宣扬推崇西方文化,试图使全球文化同质化和西方化,进一步给中非跨文化交流与互动带来很大阻碍。

(四)认同层面:“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影响中非跨文化认同

美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语言、文化以及媒体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建起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它们一方面宣扬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恶意贬损和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蜕色,或者被边缘化”。^⑩

在世界传媒格局中,非洲国家处于最底端。它们没有能力抵御西方国家发达传媒的冲击,它们中大多数甚至不能独立支付建立、维护和运营广播机构所需的费用。^⑪而中国在世界传媒格局中还未能达到高水平,以一组数据为证:在80个世界级的传媒集团中,中国仅有3个;华人约占全球的1/5,但全球信息量只有4%来自华文媒体;互联网上90%以上的内容都采用英语。^⑫虽然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存在迅速增加,但是对非洲的影响力仍然很有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存在(广度)等同于影响力(深度)。一份历时3年(2018~2021年)、约6000份调查问卷对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三国民众媒体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见下页表1),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中国媒体对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普通民众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一是中国媒体在非洲三国的受众有限,当地民众很少选择从中国媒体获取信息;二是中国媒体对非洲媒体新闻议程的影响有限,而且不均衡。相比而言,非洲民众从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获取信息的频率要高得多。该调查报告还指出,“非洲和中国的媒体接触极为不

对称,双方没有真正的交流,这最终可能会伤害到中国。”

在很大程度上,话语权意味着形象建构权和塑造权。西方国家凭借其国际传播优势,掌握着当今世界话语霸权,并以此任意塑造非洲形象和中国形象,肆意诋毁中非友好合作。一方面,西方媒体对非洲进行妖魔化报道。“在西方媒体看来,非洲除了贫穷、灾荒、疾病、暴力,甚至种族屠杀,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⑥这完全忽略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积极谋求和平与发展的事实,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正确全面认知。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西方媒体长期对非洲人的人性、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否定与歪曲。报道非洲的国际新闻有80%是源自非洲境外的媒体,尤其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美联社等主宰信息流动的国际媒体。它们对非洲进行歪曲报道的手段包括:报道失真的新闻,重复报道有关非洲的失实陈述,使用贬损的词语、暗喻或刻板印象。^⑦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报道。它们挖空心思地炮制并传播了所谓“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环境破坏论”“债务陷阱论”等一系列污名化论调,试图以此来挑拨离间中非关系,阻挠破坏中非友好合作。这些妖魔化和污名化报道危害极大,不仅在国际上“建构”和“塑造”了

非洲和中国的负面形象,而且影响到中国人和非洲人对彼此的正确认知,从而阻碍了中非之间的跨文化认同。

四、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方向

理论指导实践,理念决定行动,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先进的理念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对外传播、文明互鉴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进行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要新思想、新理念、新倡议,从而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非洲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新时代加强对非洲的跨文化传播,对于中国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改变国际传播格局,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促进中非文化交融与相互理解

根据“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话语传播过程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4个阶段。^⑧其中,话语的生产环节即信息的编码。一般说来,编码者建构的知识

表1 2020年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在非洲三国的收视(听)情况 单位:%

媒体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南非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6.5	11	2.6
英国广播公司(BBC)	40	50	3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40	50	3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	1.8	1.2	0.5
英国广播公司(BBC)	18	16	5
美国之音(VOA)	8	10	2
《中国日报》	1.8	2.8	1.2
《纽约时报》	10	12	8
《华盛顿邮报》	8	7	4

资料来源: Dani Madrid-Morales,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Global media in Africa: An Audience Analysis", https://danimadrid.net/research/2021_assessing-influence-chinese-global-media-africa-audience-analysis.pdf.

意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的效果,即怎样的信息被阅读和理解(解码)。环顾当下,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而且表现在思想、知识、话语权等方面,西方国家试图永远控制思想,垄断知识,掌握话语权。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对非洲的认知与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往往是通过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进行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不利于构建中非跨文化理解。如同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表达的观点那样,所谓的“东方学”实际上是西方对东方有意为之的误读,是为了凸显西方中心论和优越论而故意丑化和弱化东方。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⑥显然,“东方学”中的东方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被西方“建构”出来的东方,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主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⑦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必须建立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基础上,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非洲观和中非合作观,这是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自主编码的要义。也就是说,通过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我们可以给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真实的非洲和真实的中非合作图景。在2019年4月举行的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非洲学者纷纷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例如,塞内加尔地方行政高级委员会副主席兰丁·萨瓦内(Landing Savané)表示,“中非之间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发现,有的历史甚至需要重新来写,以还原其真实面貌,这项工作只能由我们中非双方来做,而不能指望西方。”埃及文物部国际组织司司长艾哈迈德·马吉德(Ahmed Majid)称,“我们不应该成为历史的囚犯,而是需要以新的方式来解读历史,正确的历史观有

助于我们打造中非关系的光明未来。”^⑧总之,加快构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知识体系,树立正确的中国观、非洲观和中非合作观,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任务。因此,中方要支持和推动中非知识界、学术界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加强联合研究、出版、翻译及人才培养,以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非洲观和中非合作观为目标,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支持建构非洲自主的知识体系,共同打破西方中心论知识体系。

(二)创新议程设置以加快构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叙事体系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设置议程直接关系到公众对事件的感知。在“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下,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国际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弱小国家并非没有自己声音,而是有声音传不出去。无论是非洲形象、中国形象还是中非合作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塑”的,而是“他塑”的,即由西方媒体和舆论塑造的,并且传播到全世界,影响人们的认知,包括中非人民对彼此的认知。美国语言学家罗宾·洛克福(Robin Tolmach Lakoff)认为,“20世纪末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语言控制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⑨这句话在21世纪同样适用,甚至更为适用。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传播格局的主导地位和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包括中非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鉴此,在中非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中方应善用议程设置,提升文化自信与互信,破除西方国家的抹黑攻讦,争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主动权。

习近平主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⑩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好的故事有助于超越文化差异,促进跨文

化理解,形成和谐的跨文化认同关系。中非应打开共享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与价值共识,以此来拓展共同意义空间。动态的共同意义空间的建构,需要调用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历史传统等共同情感,构建文化共享系统,发掘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共同体身份认同,并进行意义再生产。具体而言,在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叙事体系中,中方需要讲好3个故事:中国故事、非洲故事和中非友好合作故事。中国故事需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以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非洲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非洲故事需要讲好非洲国家和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故事、奋力实现独立和发展的故事以及谋求联合自强的故事,让中国和世界更好地了解非洲。中非友好合作故事需要讲好中非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故事,坚定不移相互支持和共同发展的故事,以及携手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非合作及其给中非双方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在讲好这些故事的同时,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非文化的共通性和相似性,以更好地促进中非相互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展现这些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以进一步加强中非团结与合作。习近平主席高度总结概括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既体现了中非双方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背后最重要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维护好、继承好、发展好中非传统友谊的宝贵财富,是中非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中非双方的共同责任。^⑩

(三)畅通跨文化互动环节以最大限度减少中非文化折扣

文化系统的形成包含文化互动、文化术语以及相应的共同意义空间与解码方式等要素。^⑪因此,中

非跨文化互动除了前文所述互动内容外,还应从互动主体和互动媒介两方面来提高,形成中非独特的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

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⑫就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而言,需要把握好“传播”和“文化”这两个关键词,做好两方面工作。在传播方面,中方要进一步扩大对非传播主体,形成政府、媒体、智库、企业、民间等多方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战、各说各话,尤其要重视发挥非洲华侨华人和在华非洲留学生的双向传播作用;要进一步优化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布局,扩大中国媒体在非洲落地,发挥官方媒体和民营媒体的协同作用;同时要加强与非洲媒体合作,加大对非洲传媒业的援助和投资力度,支持非洲传媒业发展壮大;要针对非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体,采用精准传播方式,增强传播效果和传播亲和力。在文化方面,中方要高度重视语言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中文在非洲的推广力度,同时更多培养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人才,努力消除中非交流合作过程中的语言障碍;重视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加强中非传统文化交流,扩大中非人文交流,切实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非洲现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此外,中非要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反对西方话语霸权,共同驳斥西方的各种不实论调,共同应对西方负面舆论对中非关系的干扰和破坏,向世界传递客观、公正和全面的中国声音、非洲声音和中非共同的声音。

(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间性以实现文化间性落地

文化间性的实质就是不同文化间通过相互传播与交流,进而相互借鉴、对话的动态过程,文化间性

倡导不同文化形态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形成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共同体,强调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一体化。跨文化认同是承认多元文化间共在的间性状态,呈现为多元文化间的共性共识、意义整合以及文化间协同发展的理念。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文化间性的哲学逻辑,培养平等合作、互动对话的文化间性意识是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建构的原则,旨在打造一个平等互动交流的实践范式。中非命运共同体所传递的文化平等互动交流、融合、共存的理念是中非共有的文化价值共识,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对西方霸权理念的回应与回击。中非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交往的话语体系,其文化间性建构的现实关照有利于消解文化隔阂、消弭价值鸿沟、加强互动互补、增进文化认同。

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间性建构重点在于使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非人民有针对性地展开“间性对话”,实现“文化间性”落地,通过与“他者”文化的互动与对话中达到相互尊重理解、包容适应、互补融合的经验性体悟和情感性共鸣,使中非人民获得超越语言、宗教等的理性认知,最终实现文化认同的构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认同的核心也是价值观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构建包括价值认同、身份认同和命运共同体认同在内的价值体系。在价值认同方面,中非需要共同坚持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中,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事业,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中非都需要在和平中谋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和平与发展尤为关乎中非27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非都需要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共同反对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非都需要实现民主自由,但是这种民主自由绝不是具有鲜

明种族性、阶级性和侵略性并且是虚伪的、双标的西式民主自由,而是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自由,非洲要实现适合自己的非洲式的民主自由。根据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的调查结果,有53%的非洲青年认为西式民主制不适合非洲实际,非洲国家应当寻求自己的民主制度,而认为应当效仿西式民主制的仅占39%。^②这说明,非洲人已经越来越认清西式民主自由并非“普世”的民主自由,并非完全适合非洲,需要探索非洲自己的民主自由之路。

在身份认同方面,中方一是需要加强中非同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受害者及反抗者的认同,这一身份认同具有历史性意义。殖民主义是非洲大陆至今依然贫困落后的根源,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无处不在,中非共同反殖、反帝、反霸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二是需要加强中非“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的认同,这一身份认同具有现实意义。这种关系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双方患难与共、并肩前行、团结合作的结果,根植于历史,传承至现在,未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三是需要加强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认同,这一身份认同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中非合作属于南南合作范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美西方国家是否承认,都不会改变中国的这一地位和属性。中国将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③。中非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

在命运共同体认同方面,中方一方面要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是基于中非双方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从“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

谐共生”6个方面进行。其中,文化共兴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④中国与非洲虽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彼此之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友好交往,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认同,以此促进中非全方位合作,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是只要世界各国能够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能够建成的。为此,这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以携手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五、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有助于促进中非跨文化理解、跨文化尊重、跨文化互动,并最终实现跨文化认同,而跨文化认同将为中非各领域合作奠定良好基础,创造良好条件。中非全面战略合作深入开展,不仅对双方而言可实现互利共赢,而且发展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性、持续性崛起,从而改变美西方试图长期称霸世界的国际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亟待进一步全面加强。与此同时,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一种传播都是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传播效果的展现依赖于信息的接受和反馈。单向的传播模式无法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灌输式、倾倒入式、说教式等单向传播,会对双向互动传播产生一定阻碍,削弱跨文化传播效果。”^⑤中非跨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而一定是双向的,在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同时,也要扩大非洲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在促进中华文化“走进”非洲的同时,相应也要把优秀的

非洲文化“引入”中国。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中非跨文化双向传播,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优秀文化成果,才能相得益彰、共同提升、共同发展,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中非共同的贡献。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化发展传承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第4~11页。

②龙小农著:《超越非洲范式——新形势下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冉继军:《中非媒介交往:理念、范式与特征》,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第143~160页;黄廓、李树波:《非洲传媒生态视角下中国对非传播力研究》,载《国际传播》2017年第5期,第37~49页。

④杨薇等:《非洲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效果研究》,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140~160页;王辉、郑崧:《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5期,第86~108页。

⑤龙小农:《中国影视对非传播的渠道建设与效果分析》,载《当代电影》2016年3期,第99~103页;闫成胜:《中国电视对非洲传播的现状、特点与思考》,载《传媒》2015年第5期(下),第42~44页。

⑥李玉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探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第69~79页。

⑦刘阳:《我国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

⑧[美国]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⑨孙英春著:《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⑩[美国]爱德华·霍尔著:《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⑪[美国]哈罗德·拉斯韦尔著:《社会传播的机构与功能》,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36页。

⑫孙英春著:《跨文化传播学》,第3页。

- ⑬张艳芳:《多元文化背景下跨文化认同理论的内涵及意义分析》,载《文学教育》2018年第2期,第181页。
- ⑭[美国]爱德华·霍尔著:《超越文化》,第211页。
- ⑮都永浩、左岫仙:《国内外文化认同研究综述及分析》,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年第5期,第2页。
- ⑯ Peter Adler, "Beyond Cultural Identity: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Man", in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3rd edition),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pp. 410-422.
- ⑰解晓东:《解读跨文化认同的四种视角》,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9期,第147页。
- ⑱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著、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4页。
- ⑲都永浩、左岫仙:《国内外文化认同研究综述及分析》,第2~4页。
- ⑳郑晓云著:《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6页。
- ㉑同上书,第9页。
- ㉒许利平、韦民等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 ㉓周海金、刘鸿武:《论文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对中非关系的影响》,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44~45页。
- ㉔李安山:《中国与非洲的文化相似性——兼论中国应该向非洲学习什么》,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1期,第49~63页。
- ㉕周海金、刘鸿武:《论文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对中非关系的影响》,第42~43页。
- ㉖[塞内加尔]伊卜拉希马·西拉等:《非洲大使学者谈中共二十大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载《中国非洲学刊》2023年第1期,第11~19页;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Two Conceptions of Harmon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67, No. 2, April 2017, pp. 441-465.
- ㉗ Birgit Breninger and Thomas Kaltenbacher eds, *Creating Cultural Synergie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culturality and Interreligiosity*,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p. 90-105.
- ㉘罗慧:《单波教授谈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6期,第176页。
- ㉙[美国]爱德华·霍尔著:《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 ㉚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05页。
- ㉛周子伦、刘樊德:《“共同体”概念词源、译介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脉络考察》,载《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20~21页。
- 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年11月),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和第26页。
- ㉝段龙江:《我国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优化路径》,载《人民论坛》2021年5月中,第99页。
- ㉞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2013年3月25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05页。
- ㉟1998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上提出,在加强传统的文字和声像传播手段的同时,应利用最先进的“第四媒体”——互联网。自此,“第四媒体”的概念正式得到使用。
- ㊱ Internet World Stats, "Internet Users Statistics for Africa", <https://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1.htm>, 2023-05-08.
- 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年11月),第28~29页。
- ㊳王珩编著:《中非人文交流简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 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年11月),第25页。
- ㊵《中国援非医疗队获“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集体奖》,载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4/12-19/6895266.shtml>, 2023-05-10.
- ㊶ Victoria Breeze and Nathan Moore, "Why African Students Are Choosing China", *The Conversation*, June 27, 2017.
- ㊷《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载中国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2023-05-15.
- ㊸单波、刘欣雅主编:《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④④Afrobarometer,"Africans' Perceptions about China: A Sneak Peek from 18 Countries",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migrated/files/africa-china_relations-3sept20.pdf, 2023-05-18.

④⑤ Ichikowitz Family Foundation,"African Youth Survey 2022", <https://ichikowitzfoundation.com/storage/ays/ays2022.pdf>, 2023-05-21.

④⑥彭青龙:《世界多样性与交流互鉴》,载《外国语文》2022年第6期,第2页。

④⑦杨文艺:《全球竞争的文化转向与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孔子学院十周年回眸与展望》,载《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4期,第46页。

④⑧Afrobarometer,"Africans' Perceptions about China: A Sneak Peek from 18 Countries".

④⑨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06~107页。

⑤⑩ Afrobarometer,"Africans' Perceptions about China: A Sneak Peek from 18 Countries".

⑤⑪黄力之:《再论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载《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第87页。

⑤⑫[美国]爱德华·W. 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0页。

⑤⑬[美国]赫伯特·席勒著:《大众传媒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⑤⑭杨薇等:《非洲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效果研究》,第153~154页。

⑤⑮[美国]赫伯特·席勒著:《大众传媒与美利坚帝国》,第107页。

⑤⑯吴传华、郭佳、李玉洁著:《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⑤⑰倪建平:《中国在非洲的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载《对外传播》2008年第1期,第44页。

⑤⑱姜飞:《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载《新闻理论》2006年第1期,第19页。

⑤⑲[美国]赫伯特·席勒著:《大众传媒与美利坚帝国》,第109页。

⑥⑩单波、刘欣雅主编:《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第88页。

⑥⑪龙小农著:《超越非洲范式——新形势下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⑥⑫Molefi Kete Asante,"The Western Media and the Falsification of Africa: Complications of Value and Evalu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Vol. 9, No. 2, 2013, pp. 64-70.

⑥⑬[英国]斯图亚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肖爽译,载《上海文化》2018年第2期,第。

⑥⑭[美国]爱德华·W. 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1页。

⑥⑮《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⑥⑯参见2019年4月9日非洲学者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非合作与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速记稿)。

⑥⑰[美国]罗宾·洛克夫著:《语言的战争》,刘丰海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⑥⑱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6页。

⑥⑲吴传华、贺杨、卫白鸽:《习近平新时代中非合作观:时代背景、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5期,第73页。

⑦⑩[美国]爱德华·T. 霍尔著:《无声的语言》,第25页。

⑦⑪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第316页。

⑦⑫ Ichikowitz Family Foundation,"African Youth Survey 2022", <https://ichikowitzfoundation.com/storage/ays/ays2022.pdf>, 2023-05-21.

⑦⑬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6页。

⑦⑭习近平:《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2018年9月3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49~450页。

⑦⑮段龙江:《我国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第99页。